

蒙古人汉化和汉人蒙古化的理论思考：以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为例

珠飒

(内蒙古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 蒙古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蒙古化, 是蒙古社会由牧向农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也是该时期蒙、汉民族关系的最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本文选择了较有典型意义的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为中心, 通过对汉族移民对移入地区带来的影响、蒙古人汉化和汉人蒙古化的概念、相互关系以及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记忆、民族认同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几种历史现象的分析, 认为蒙古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蒙古化, 是蒙、汉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两者之间的相吸相融的过程中, 土默特蒙古人丢掉了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和语言。但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 深化着他们对本民族的眷恋, 成为了维系一个民族的重要精神纽带。这对于土默特蒙古人内部来说是一种民族认同心理, 加强凝聚力的核心, 实现民族统一性和继承性的最显著的标志。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 提升了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情感、记忆、价值、传统的重要性, 证实了一个民族可以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来传承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现实。

关键词: 蒙古人的汉化; 汉人的蒙古化; 历史记忆; 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汉人的蒙古化与蒙古人的汉化, 是蒙古社会由游牧向农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也是该时期蒙汉民族关系的最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蒙古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蒙古化”, 同时存在、相互影响, 构成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多元文化交流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在这种多元文化体系内, 蒙、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并不局限于文化的单向变动”, 而是蒙、汉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1]

一、问题的切入：汉族移民对移入地区带来的影响

蒙古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蒙古化过程中, 关系密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汉族移民对移入地区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问题。汉族移民是农业文明的创造者, 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互补性, 最终决定了农耕文化在游牧地区推广和深入。尽管汉族移民的行为是受生存所迫和利益驱使, 但是他们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和灌溉农业技术, 还是在移入地区摧毁了水草和牲畜的结合, 改变了游牧经济的基础。由此在蒙古地区造成了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促成了游牧向农的转型, 改变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欧文·拉铁摩尔指出“汉族社会固有的普遍特征是不从古老的秩序离开, 又不建立任何新秩序, 但只是延续古老的秩序。”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形式上仍然蔓延已经定型并停滞不前的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古老的封建社会制度和秩序, 根本上没有脱离其母体社会。在这个意义上, 美国汉学社会学家Reardon-Anderson得出的结论是: “他们的社会只有扩大, 但没有变化和发展”。但是在新的环境下, 他们用最快的可能性复制、延伸和扩大其固有的制度, 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保持高度协调, 形成超稳定结构, 给原本单一的游牧社会带来了“农进牧退”的局面。

在此过程中,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形成和发展的农业文明对移入地区具有强有力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够给移入地区带来畜牧业以外的产品和利润, 改变了一直以来依靠“边口”贸易而获取日常用品的游牧生活状况。受利益的驱使, 蒙古族上层王公、贵族开始接纳了这些移入者, 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的态度。移入者们以王公府邸为中心, 影射周围并强有力的势头一步一步深入到蒙古

腹地，遍地撒满了农耕的种子，从而生根发芽，使密集的移居地和集约性农业占满了蒙古人的游牧地带，改变了蒙古社会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影响到了他们日常习俗，成为了蒙古人汉化和汉人蒙古化的社会基础。

二、蒙古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蒙古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蒙古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蒙古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汉人受蒙古文化和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而言的。蒙、汉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受农耕与游牧文化的熏染、陶冶而使自身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发生的变化。其核心是文化的双向变动，是蒙、汉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吸相融或相互“涵化”，是显露于外的民族特点的变化。从明末俺答汗时期已开始的汉族移民活动，延伸到今天的“西口文化”，一直影响着蒙汉民族文化与生活的各个角落。经过蒙汉民族间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接触、混杂以及相互通婚等，蒙古族不仅接受和融纳了大量的汉族移民，而且为数不少的蒙古人也融入到了汉族移民社会中。移民区的蒙汉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新型方言和地方文化，而且依稀地保留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和特点。

汉人的蒙古化与蒙古人的汉化，是蒙古社会由游牧转向农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蒙古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蒙古化都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①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的程度和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因时而呈现差异，在不同时期表现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开始移入汉族移民受蒙古文化的影响比蒙古人受汉文化的影响要深刻，出现了归化蒙古人。该时期移入归化城土默特旗地的汉族移民大多数是在内地无法生存的难民，由于生计需要而迫使他们“依蒙古族、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以个体的身份融入到蒙古族社会文化氛围。而此时的蒙古人凭借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融入这些客居的汉族个体。实质上反映的是汉族的个体对蒙古社会的适应过程，是对蒙古族文化的选择和认同的过程，属于自然同化的范畴。所谓自然同化是指不同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完全自然和自愿的情况下接受另一方民族的特征，改变自己民族的特征而变成另一方民族的现象。随着移入蒙地汉族移民群体的壮大，蒙、汉民族关系亦随之出现了转折。原住蒙古人原有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政治、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均处于从属地位。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其丧失了自己许多民族文化特征。生产方式和语言环境的变化，促使土默特蒙古人开始“依汉族，习汉语，行汉俗”，成为了蒙古民族中汉化最早的群体。

三、蒙古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蒙古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社会现象

蒙古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蒙古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社会现象。两者之间的相吸相融的过程中，蒙古人所受汉文化的程度要高于汉人所受蒙古文化的程度。如果说早期汉人的蒙古化是个体行为，那么蒙古人的汉化则属于群体行为，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汉人的蒙古化程度。蒙古人的汉化是政体的汉化，社会的汉化，是全体民族的汉化，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和日常习俗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变革。

生存环境是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环境的变化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整体规模和特点。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农耕经济的推广，蒙、汉杂居格局的形成和府、厅、州县的建立，无不意味着原本单一游牧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环境的变化，对移入汉族移民来说，环境的变化是一种生存空间的移动、是本土化的过程。他们将农耕社会的基础村社制和内地中央集权制统治下的地方行政建置带到了移入地区，从而改变了移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和司法体系。这是客籍的汉族移民社会走向成熟和壮大的象征，成为了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力促进共同利益的保障。同时，他们不断的吸收和重塑它所接触的游牧文化，使移入地区文化发生了变异，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新型文化区域。无论是制度层面、社会领域，还是日常习俗和语言等方面，“归化土默特地区可以说是晋文化区的向北延伸，但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文化亚区，带有多采的汉文化与蒙古文化结合交融的风貌。”^[2]如其语言，“居民多由山西迁移来，因开辟年代较早，移民遂成土著，语言亦早脱离山西语而成一种本地语。”^[3]对原住蒙古人来说，这种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适应、选择和抗拒并存的过程，意味着他们祖祖辈辈经营和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的衰退。他们为了适应变化不断的周

围的新环境，认识和接触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事件。对他们来说，这种变化更加无情，为此他们付出的代价很大。牧民变成了农民，改穿汉服，改变了日常习俗，面临着失去本民族语言、文化的现象。所以，在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中，如果仅涉及生活习俗领域的变迁，那么这种研究本身局限于历史的表象，不能涉猎在其表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和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四、个案分析：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

第一个比较完整科学的民族定义，是斯大林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4]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的深入，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不仅是语言还是其他民族特点的消失情况，在全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经常出现，引起了中国民族理论学界的高度重视。2005年中国出台了适合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具体情况的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重新阐述了民族的含义，认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5]比起以往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强调了共同的历史渊源和共同的文化在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记忆

经过明末清初以来农耕文化的冲击，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渐次远离于游牧生活，在其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农耕文化的气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曾逗留过归化城土默特。据其所见，此时的土默特旗蒙古人“并不过游牧生活，他们既耕耘农田，又从事文明民族的所有行业”。^[6]该时期，在古伯察笔下的土默特两翼蒙古人“完全如同大家可以想象的那样，全部失去了蒙古人的性格特征，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6]在农耕文化与农耕民族占据主流的社会条件下，土默特蒙古人更多关注如何适应农耕民族和农耕文化，从而开始了其对农耕文化的适应过程，开始学会了农耕生产和定居生活，改穿汉式衣服，语言日趋汉化，更甚者，部分成员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有时还有人对于那些草原尚未被犁铧耕的兄弟们，表现出一些鄙视。他们对那些永远过着一种游牧生活并居住在简陋蒙古包中的人，感到可笑，这些人本来可以容易地建造住宅并向他们占据的大地索取财富和享受。此外，他们也有某种理由更为喜欢农夫而不是牧民的职业，因为他们居住在一片平川沃野，灌溉条件优越，特别肥沃，适宜种植各种农作物。”^[7]这是在汉族移民文化占据主流文化背景下，成为一种弱势文化群体的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的个体，对主流文化的一种认同和它所表现的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鄙视和渴望脱离本民族群体的一种倾向。也是文化适应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内部分离和民族认同上的分化现象。“文化适应是个体与其他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多纬度适应过程。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对其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样就形成了整合、同化、分离以及边缘化等不同的适应途径。”^[8]这是喇维新通过对西北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健康与高校管理策略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清代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对农耕文化的适应过程中所表现的对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已经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在中国这样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中，历史的车轮不断地印写着不同文化之间适应的过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和认同本身有着诸多共性。“文化适应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一个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的价值判断的问题，当认为主流文化的价值大于传统文化时，民族认同就倾向于全力适应主流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担心是否能够被主流社会接受的自卑感和民族归属感缺乏的情况。”^[8]

作为主流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弱势文化，使得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内部产生了民族认同上的分化。对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的比较中，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日益贫穷化的社会经济地位，“积极学习主流社会强势民族的语言、习俗及生活方式，并努力使自己融入成主流文化下强势群体的一员”^[8]，从而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偏见，开始有了游牧不如农耕的思想。土默特蒙古人的个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本身，“反映了个体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和归属倾向”。^[9]土默特蒙古人固有性格的这种变化中，大部分成员却始终保留着对传统与游牧的高度酷爱，情感上或意识形态领域仍处于无法脱离和难以

忘却游牧文化的状态。如《绥远通志稿》载：“各旗蒙人宴会时，或结婚时，必有数人合组唱歌，皆为吉庆之词，歌时尾声悠长而高亢。歌之用韵，在句首而不在句尾，即平常民谣、野歌亦然。此由蒙汉文字结构不同，故用韵适相反出。歌之乐器有二股胡琴、四股胡琴及洋琴、笛子，合奏以和之。玩其音调，多激越慷慨之气，而无柔靡之风，殆风土使然也。野歌多为耕种不如畜牧或男女相思相悦之词。〔10〕这足以见证蒙古人对传统游牧生活的眷恋和对其民族文化的崇尚。

历史记忆，是指个人或者集体对过去的记忆。一般来说，历史记忆呈现两种形态：一是间接被历史记录的记忆，另一是自己经历的记忆。前者是常识性的族群认可，后者则掺杂了个人心理或感情。因此，历史与记忆既相互依存，又相对排斥。相互依存使历史得以延续，相互排斥则使历史受到修正。〔11〕农耕化的土默特蒙古人来说，这种传统的印迹和文化的象征为纽带的眷恋和崇尚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经历的记忆。这种掺杂了个人心理或情感的“自己经历的记忆”，更加强化了“历史记录的记忆”。这种两种不同的形式延续下来的历史记忆，恰恰是构成了土默特蒙古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成分。作为共同的记忆、共享的历史、文化互相印证，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为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成为了维系和凝聚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文化与情感的纽带。

（二）土默特蒙古人的民族认同

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是构成民族的重要要素。民族语言是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彼此交流思想感情、交往联系所使用的语言，是表露于外的最明显的特征。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发生变异最快且最早消失的是语言，其次为文化，最稳定的是认同。民族认同也是发展变化的，但其变化是渐进的、缓慢的、是渐变的历史变异过程。

随着民族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逐渐消失，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认同将是最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最明显的标志。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精髓，认同感产生的源头和认同的基本内涵。所谓共同心理素质，通俗地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包括许多成分的复杂心理结构系统，具体可分为认知成分系统和情感成分系统”。认知成分系统是指对有关民族文化的知识的了解和熟悉，情感成分系统是指对民族文化的主观突显性、依赖程度、归属感、自尊心和自豪感等。〔12〕上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将“共同心理素质”解释为“民族认同感”或“民族自觉的认同意识”，民族认同被认为“共同心理素质”的构成元素。民族认同则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3〕这样许多丧失了共同地域、语言的民族，就是用认同感来维系其文化的。这也是土默特蒙古人，虽然语言、习俗、生活方式上都与汉族相同了，但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蒙古人而不是汉人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情感成分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共同历史的记忆和共同文化渊源是把土默特蒙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统一性和继承性的最显著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加强民族凝聚力的信息符号。“任何民族都会充分利用历史留下来的符号资本并且通过周期举行的各种仪式和社会活动使之‘增值’。想象中的共同祖先和由此拟制的谱系和亲疏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和民族认同标志，这个标志的意义和活力不在于字面或者记载，而在于民众对其的解读、宣传和再解码，以及因此产生的号召、响应、参与、互动等功能和不断强化的社会记忆，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和活力在于社会行为。”〔14〕

民族研究中，人们把民族置于广泛的人文背景之下，着重民族文化因素的根本所在。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很好地证实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所起的重要作用。真正把土默特蒙古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传统的记忆和情感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因素。这些使他们具有了一种共同的意识、观念和标准，产生了对民族的认同和价值认同感。这种共同的意识、观念和共同文化为底蕴的民族认同，具有内聚性、向心性、自识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土默特蒙古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成为了维系、凝聚本民族成员的重要精神纽带。有人概括：“民族是一种以文化亲近性(cultural nepotism)为根基，以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与结构性健忘(structural amnesia)为工具，来凝聚及调整人群，以适应现实资源之争的人类社会结群现象。”〔15〕在这里强调的是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在民

族间的交往中,受他文化影响,容易发生变化的往往是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民族具有特征。在这样前提下,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却成为了维系一个民族的重要精神纽带。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天然边界,历史记忆为其提供合法性,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成为认同本身的组成部分。”[16]在这点上,历史人类学强调的是历史与记忆的互动,认为“并非所有的事件都留存在记忆中,而是根据其社会重要性的逻辑被记忆。”[17]

民族认同(感)的理论和分歧是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最热烈争论的理论问题之一。其中原生论和工具论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②该两种观点对民族认同的基本理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社会现象。“根据原生论模式(the primordialist model)的观点,族群归属感持续,它个人认同的根基。因为社群即以亲属关系、邻里、共同的语言和关于超自然的信仰以及某些该群体起源的叙事和神话,甚至包括神圣的归属感这些原生要素为基础的,所以族群认同主来自于天赋或原生性的情感纽带。场景论模式(the circumstantialist model)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层次性。为了适应多元社会中的经济生境,一个群体可能强调共享的族群认同作为增强协作的手段,将族性视为不同利益和地位群体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源。”[18]根基论所坚持的这种情感或血缘上的认同感是一个民族区别与其他民族而独立存在的重要因素。场景论则强调了社会的互动性。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19]可见,民族认同是在民族互动中产生的,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强化了根基论和场景论之间的联系性,体现了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情感、记忆、价值、传统的重要性。任何民族认同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要素来表述,民族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要素。时代可以变化①,条件可以不同,但是一个民族所传承下来的族群的神话、记忆、价值等,“却可以保持稳定,可以附着、渗透在不同的原有或者外来的文化特征上”[20],成为人们传递‘异己’感觉的重要文本。[21]

五、结语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作为早期移民的典型,最终导致汉族客籍而逐渐定居并构成主流文化,土默特蒙古人却失去了彰显民族特征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和维系民族情感的语言。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蒙汉杂居和民族之间的相吸相融的过程,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土默特蒙古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反而更加强烈,在他们身上仍然体现着蒙古民族固有的性格特点,依稀地保留着民族文化。在汉化日趋严重的今天,面对各种现代社会挑战,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底怎样的力量维系他们的民族情感,保持一个独立民族身份的问题。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它自身的发展、发育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族体特征也在变化,使得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变动性和交融性。[22]清代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与汉族之间长期的交流与交往过程中,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使自身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发生变化,显现民族特点的变动性。同时形成的与汉族之间具有的诸多共同性,表现出两种文化的交融性。面对语言的流失和汉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土默特蒙古人还是保留着蒙古人固有的性格魅力,影响着蒙汉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如汉族商人眼中的蒙古人的性格:“我很早就认识鞑靼人了,他们都很好,心术正直。我们这些中原人却并非如此,我们都惹人讨厌和狡黠,在一万中原人中才勉强能找到一个有德之士。在本青城,几乎所有人都以欺骗鞑靼人和强夺豪取他们的钱财为生。”[23]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之一,从一个民族的语言当中,往往最能真实地反映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及其心理情感。一般来说,只有在具备共同语言的前提下才会形成民族的凝聚力——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排他性,即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之处。土默特蒙古人虽然选择了汉语为日常交际工具,但在汉语的组成部分中仍保留很多蒙古词汇,形成了土默特蒙古人的语言区别于汉语的独特性。他们所说的这种汉语,对外人来说莫明其妙,然而土默特蒙古人却运用自如,心领神会。这对于土默特蒙古人内部来说是一种民族认同心理,土默特蒙古人民族情感的真实再现,彰显了自己民族特色,强化了民族认同。土默特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怀并没有随着语言的汉化和生活习俗的汉化而消失,反而更加强烈,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身份,适应着激剧变革

的社会环境。耕种不如畜牧的歌词和“大抵蒙歌多形容游牧之乐及大地自然景象”[24]及清末都格尔札布等人力图普及蒙学教育的努力等，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和眷恋。这种对传统的情感与眷恋，是早期农耕化的土默特蒙古人特有的民族和文化的象征，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文化渊源。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情感的重要来源，不同的历史记忆规定了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不同的自我想象，也成为群体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纽带，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25]民族认同的先决条件是保留历史记忆，一个失忆的民族，是无从产生民族认同的。[11]这就是历史记忆的意义所在，证实了一个民族的存在，阐释和建构一个族群认同的历史。[26]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族认同意识的核心内容。任何民族离开文化都不能存在，民族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传统的游牧文化，构成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历史与文化联系的象征性链环。这种被传统文化塑造的情感和历史记忆，深深地印刻在土默特蒙古人的心灵深处，凝聚着无法改变的民族认同。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已经汉化的土默特蒙古人的日常习俗和性格特点中，仍依稀地保留着对传统的印记，加深他们的民族感情与民族认同，成为了凝聚力的核心。蒙古人汉化和汉人蒙古化，是蒙、汉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现象。两者之间相吸相融的过程中，土默特蒙古人丢掉了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和语言。但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深化着他们对本民族的眷恋，成为了维系一个民族的重要精神纽带。这对于土默特蒙古人内部来说是一种民族认同心理，加强凝聚力的核心，实现民族统一性和继承性的最显著的标志。土默特蒙古人的历史，提升了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情感、记忆、价值、传统的重要性，证实了一个民族可以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来传承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实现。

注释

①所谓归化蒙古人是指入蒙籍汉人。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明末俺答汗时期，为了逃避战乱或被掳掠到土默特地区，“配有妻室，积有财物，甘心顺虏，忘却故乡”的入蒙籍汉人。第二种是清代初期，为了生存背井离乡，迁徙土默特地区的汉人为了改变口内赤贫的日子，为蒙奴、为蒙僧等各种手段入蒙籍的汉人。第三种是明清鼎革时期，反清战败的明朝官员或他们的后裔，为了改变潜逃生涯，改姓换名，娶蒙妇入蒙籍的汉人。据《绥远通志稿》记载，万家沟之创始人万有孚，山西偏头关人，明清鼎革时期，反清失败，潜入大青山，向蒙旗租地开采，以维生计，历年既久，聚族而居，沟以姓名，名曰万家沟。康熙年间，由于朝廷查诘甚严，其后裔遂徙他处，与蒙族婚入旗籍，居毕克齐，且谓玉禄、武尔功，即其后人，以皆为王姓。

②原生论又称为根基论，认为民族的情感纽带是原生的，用感情和本能约束为民族认同（感）的一个重要解释。工具论又被称为场景论，其主张与原生论相反，它关注的是社会的互动，强调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他们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是该群体成员作出选择的出发点。随着不同情势、不同环境变化而导致的民族认同是可变的、不稳定的，因而民族认同也显现出多重性。详见张宝成：《民族认同研究述评》，《前沿》，2010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 [1] 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J]，历史研究，2009，（1）
- [2] 安介生，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兼论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区文化建设中的贡献[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 [3] 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编印，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M]，1934年铅印本，第20页。
- [4] 斯达林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94。
- [5] 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3。

- [6] [法]古伯察著,耿升译. 鞑靼西藏旅行记[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54. 101-102
- [7] [法]古伯察著,耿升译. 鞑靼西藏旅行记[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101-102.
- [8] 喇维新. 西北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健康与高校管理策略的研究[M]. 硕士学位论文, 2003. 34-40.
- [9] 王亚鹏, 万明钢. 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民族教育研究, 2003, (4).
- [10] 绥远通志馆编. 绥远通志稿[M]. 第七册, 卷 51, 《民族·蒙古族》,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163.
- [11] 罗维庆等. 变异的三月街: 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J]. 民族论坛, 2010, (5).
- [12] 佐斌. 论儿童国家认同感的形成[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0, (2).
- [13] 王希恩.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 民族研究, 1995, (6).
- [14] 纳日碧力戈.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238.
- [15] 王明珂. 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台湾的族群经验认同与国家[A]. 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C]. 1994. 249-275.
- [16] 张海超. 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化发展[J]. 云南社会科学, 2004, (3).
- [17] 蓝达居. 历史人类学简论[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1, (1).
- [18] 兰林友. 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 [19] 费孝通著.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7.
- [20] 纳日碧力戈.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61.
- [21] 杜磊著, 马海云、周传斌译, 王建民校. 中国的族群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造[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 [22] 吴仕民主编. 中国民族理论新编[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46.
- [23] [法]古伯察著,耿升译. 鞑靼西藏旅行记[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116.
- [24] 绥远通志馆编. 绥远通志稿[M]. 第七册, 卷 51, 《民族·蒙古族》,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01.
- [25] 鄂崇荣. 多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2).
- [26] 李滨等.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鄂西南一个移民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Mongolianation of Chinese and Chinesization of Mongolians: A Case of Tumote Area of Guihua City in Qing Dynasty

ZHU-Sa

(Ph.D. in History,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Study,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Inner Mongolia, Inner

Abstract: Mongolianation of Chinese and Chinesization of Mongolians are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a occurred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golian society from animal husbandry to farming, and is the most prominent contents and form of expression in that area.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typical and meaningful Tumote area in Guihua City during Q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 related but different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influences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to the local Mongolian area, the terms of Mongolianation of Chinese and Chinesization of Mongolian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 historical memories of local Mongolians in Tumote area, acknowledgement of ethnic groups, we demonstrated that Mongolianation of Chinese and Chinesization of Mongolians is mutual acculturation of the two different cultures. During the absorpt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ultures, the Tumote people lost their traditional economy, life style and the dialects. However, the common memories and sentiments deepened their longing for their own culture, and became important spiritual tie to maintain the ethnic characters. For the Tumote Mongolians this is a mental identification, the core of cohesion, as well as the most prominent symbol of fulfilling unification and succession of their nationality. The history of Tumote Mongolians promotes the importance of affection, memories, values and tradition, demonstrated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an ethnic group to inherit their ow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language of another ethnic group.

Keywords: Mongolianation of Chinese; Chinesization of Mongolians; historical memory; ethnicity identification

收稿日期: 2013-10-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蒙古族的汉化和汉族的蒙古化比较研究: 以土默特地区蒙古族和汉族的语言、文化和民族认同关系及其变迁为例》(2009JJD850001);

作者简介: 珠珮(1968-), 女,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人。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教授,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清代以来内蒙古民族、社会史方面的研究。